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国际政治

中东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 田文林

中东剧变数年来，地区旧格局被彻底打破，并出现系统性崩溃迹象。动荡持续将成为中东“新常态”。

民主转型未能拯救中东国家

中东剧变以来，中东威权政体纷纷垮台，但随后启动的民主转型，未能拯救中东。

中东剧变前，阿拉伯国家当权者牢牢掌控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安全稳定等“公共产品”。随着威权政权垮台以及民主化启动，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出现中央政党内耗、权力空转、安全形势恶化等种种新问题。例如：埃及短短四年经历两轮政府更替；利比亚出现“两个议会、两个总理”；也门胡塞武装乘势兴起，政府运行陷入瘫痪；叙利亚政局动荡演变为全面内战；突尼斯两位反对党领袖被暗杀，临时政府三次更迭。

所谓民主转型并未有效解决阿拉伯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中东民主转型 “只开花，不结果”。缺乏治本之举，加上政局不稳，使相关国家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埃及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经济至少倒退15-20年；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半失败国家。突尼斯经济持续下滑。叙利亚经济恢复至少需要30年。总之，民主转型并未给中东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引发严重政治衰朽和经济恶化，“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阿拉伯国家仍需探索新的治理模式。

地区博弈呈现“地缘争夺+教派冲突”的“新冷战”态势

中东剧变后，中东权力格局重新洗牌，温和阵营中，沙特等海湾国家凭借“钞票换平安”，成功躲过“政权更替潮”，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领头羊”。激进阵营中，伊朗政体稳固，综合国力较强，加上在地区热点问题中敢于使用武力，地区影响力日趋提升。中东地区博弈日渐成为沙特与伊朗间的较量。

这种“新冷战”表现在各个领域：在地缘政治领域，沙特与伊朗将实力相对弱小的地区国家作为博弈战场和战略棋子，展开代理人战争。在经济领域，沙特凭借其拥有的7500亿美元外汇，以及第一大产油国地位，自2014年6月以来主动发起价格战，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弱伊朗。在安全领域，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宣布将成立共同的海军部队，就是为了应对“伊斯兰国”和伊朗的威胁。在媒体领域，伊朗媒体频频指责沙特王室腐朽，并指责沙特在伊斯兰世界制造冲突。沙特也指责伊朗是中东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据维基解密称，沙特高官曾向美国建议军事打击伊朗，并赴俄谈判，以采购俄石油换取俄中止对巴沙尔政权和伊朗支持。由于沙特与伊朗内政外交均有较重宗教色彩，因此双方博弈兼有“地缘政治+教派冲突”双重性质。

沙伊“新冷战”导致地区形势更趋动荡。一方面，地区国家教派矛盾升温。中东多数国家都是逊尼派与什叶派混居，但教派矛盾并不突出，至少不是主要矛盾。随着中东形势日趋失控，中东各国部族、教派等原生性矛盾普遍升温。沙特与伊朗地区争夺，使上述矛盾火上浇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均不同程度出现教派冲突升温迹象。这种以教派冲突为底色的地区矛盾，比单纯的国家利益争夺更难化解。另一方面，以色列成为“鹬蚌相争”的最大受益者。以色列长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敌对包围中，最希望伊斯兰世界陷入内讧，从而无暇或无力对其围堵。中东剧变数年来，中东温和与激进阵营内斗加剧，使相关国家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明显，以色列地缘环境日趋改善。



“伊斯兰国”异军突起

中东剧变以来，中东政治保守化趋势明显：2011年中东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垮台或削弱后，“穆斯林兄弟会”等温和伊斯兰运动风光一时。但随着中东乱局进入深水区，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宗教势力后来居上。与其他极端恐怖组织相比，“伊斯兰国”具有四个新特征。一是政治野心更大，其目的是建立跨境逊尼派国家。二是政策更极端。该组织主张严格恪守伊斯兰法，还屡屡用绑架勒索、斩首、杀戮、活埋等血腥方式对付“异教徒”和俘虏。这种极端做法甚至连“基地”组织都无法容忍。三是财源更充足。“伊斯兰国”通过收取保护费、走私、绑架、抢银行、海湾捐助等方式，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恐怖组织”。四是战斗力更强。“伊斯兰国”创立初期，只会安放路边炸弹，无力与美军或伊军正面相抗。但如今该组织已经能够娴熟运用各种轻重武器，实施地面群组协同作战，是“最难缠的恐怖分子”。

中东地区秩序是英法殖民者由外部强加的，因而先天不足，试图颠覆和重组地区秩序的诉求始终不绝。“伊斯兰国”兴起后，宣称其目标之一就是摧毁英法划定的边境和国家，并扬言在五年内占领整个中东、非洲东部、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黑海东部、南部和西部，亚洲中部和西部，建立一个“哈里发帝国”。这种狂妄想法虽不可能实现，但“伊斯兰国”搅局使维系近百年的主权国家体系根基动摇。

首先，伊拉克“一分为三”可能性增大。伊拉克当年由英国殖民者制造，由奥斯曼帝国三个行省（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拼组而成。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使该国三大教派矛盾由隐性转向显性。当前“伊斯兰国”建国并煽动教派仇恨，使伊拉克教派矛盾更趋恶化。伊拉克很可能沿着自然和历史界限形成三足鼎立的分裂局面。

其次，叙利亚面临分裂前景。叙利亚种族和教派林立，结构比伊拉克还要复杂。从宗教信仰看，85%居民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占60%，阿拉维派占12%，逊尼派库尔德人占10%，德鲁兹派占5%），还有13%信奉基督教。目前巴沙尔政府日趋失去对全国掌控。“伊斯兰国”将叙利亚作为扩张重点，不仅打通叙伊两国边境，而且不断扩张领土，叙地缘版图碎片化已成定局。

再次，库尔德人问题日渐凸显。库尔德人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四大民族之一（其他三个民族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但至今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库尔德人谋求独立运动一直延绵不绝。2014年6月“伊斯兰国”兴起后，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武装乘乱占领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地盘一夜间扩大40%。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与伊拉克库尔德人联手迹象越来越明显。

恐怖组织成为地缘政治的新主体

中东地区恐怖活动一直十分猖獗。中东剧变后，中东地区安全真空增大，为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丰厚土壤。“伊斯兰国”成为中东极端恐怖组织的“领头羊”和“策源地”，并将整个西亚北非的极端势力连点成面：自东向西，出现了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也门“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黎凡特地区的“伊斯兰国”、北非“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等恐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还得到几十个极端恐怖组织支持。受这种极端思想影响，西方国家“独狼式”恐怖袭击事件明显增多。“伊斯兰国”兴起使反恐成为中东的新难题。

总之，在中东地区，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解决，动荡仍将是中东“新常态”。

乌克兰危机——没有赢家的俄美博弈

□ 韩奕琛

2014年3月18日，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联邦。俄总统普京随即发表讲话称：“凡事皆有底线。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的西方伙伴逾越了底线，行事鲁莽、不负责任且不专业”，“如此丧失政治嗅觉和分寸感，没有预见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俄罗斯已经处于无路可退的境地”。普京的强硬表态道出了俄罗斯与美国“硬碰硬”的根本原因，即西方触碰了俄罗斯的底线。危机爆发一年多以来，俄罗斯与美国几番较量，保证乌克兰不彻底倒向西方就是其坚守的安全底线。

从历史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属东斯拉夫民族，血缘上最为亲密。乌克兰首都基辅则是最早的东斯拉夫民族国家——基辅罗斯的首都。三个现代的东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均起源于此。公元十七世纪，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帝国，从此与俄罗斯分分合合几百年，直到苏联解体后，成为独立国家。但是在俄罗斯人的传统观念中，同宗同源的乌克兰一直是强大的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他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美国支持乌克兰去除俄罗斯影响，无异于否定俄乌上千年的共同历史和兄弟民族情谊，这在俄罗斯看来无法接受。

从现实来看，乌克兰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天然屏障。乌克兰地理位置特殊，南邻黑海，东接俄罗斯，西连波兰、罗马尼亚等4个欧盟国家，北邻白俄罗斯，处于俄罗斯与欧洲的中间地带，地缘政治地位非常重要。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只能建立一个亚洲大国，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如果乌克兰倒向西方，俄罗斯将彻底失去抵御西方势力的战略缓冲带，将西部边境直接置于西方威胁之下。

此外，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是俄黑海舰队驻军之地。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多次征战、付出沉重代价所得，是通向黑海、地中海的窗口，关系到俄战略利益。1954年，为纪念俄乌合并300年，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由俄罗斯划归乌克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租借塞瓦斯托波尔作为黑海舰队驻地。对俄而言，制约乌克兰，保住黑海舰队驻地，对于维护海上力量意义重大。而塞瓦斯托波尔在法律上属于乌克兰，俄乌关系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威胁俄黑海舰队地位。因此，俄罗斯绝不会在与西方的较量中轻易放手，宁愿付出巨大代价“收复失地”，保住自己的战略空间。

对于乌克兰而言，为了巩固自身独立和安全，必须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因此虽然与俄罗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得不一直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徘徊，在夹缝中求生，但乌克兰向西的步伐坚定，始终将加入欧盟当作长期目标。

美国在俄罗斯周边推进，不断挑战俄罗斯的底线。在俄罗斯西边，美国竭力推动北约在中东欧地区扩张，一方面遏制俄罗斯，另一方面加强美国在北约的地位，并扩大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三轮东扩之后，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加入北约。北约成员国从冷战结束时的16国增至28国。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进一步缩小。这对一贯看重地缘政治和势力范围的俄罗斯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小布什政府曾计划在捷克、波兰部署反导系统，俄认为此举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强烈反对，并威胁在俄西部与波兰和立陶宛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州部署导弹预警雷达系统。克里米亚入俄之后，美重提欧洲反导系统，计划2018年前在波兰部署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使俄美双方有限的互信更加脆弱。

在独联体地区，美国对转型中的前苏联国家展开民主攻势，支持亲西方势力发动“颜色革命”建立亲西方政权，试图分化独联体，进一步孤立和遏制俄罗斯。“颜色革命”多米诺骨牌般在独联体地区蔓延。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到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干涉显而易见。乌克兰是西方遏制俄罗斯影响力的关键国家。2009年，欧盟正式启动东部伙伴计划，希望发展同原苏联6个加盟共和国的伙伴关系，甚至未来将这些国家拉入欧盟，乌克兰就是第1个目标。俄罗斯对此反应强烈。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甚至北约，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将延伸到俄罗斯家门口。

俄美博弈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美国不允许形成对其构成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甚至把俄罗斯视为与伊斯兰国同等的世界三大威胁之一，不断瓦解分化俄罗斯战略空间。俄罗斯则习惯性认为自己仍是世界大国，坚信自己是世界独立一极，认为只有做强国，才能拥有平等和尊严。俄把独联体一体化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视独联体为自家后院，希望通过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整合后苏联空间，重塑大国影响力。乌克兰是独联体除俄罗斯外最有实力的国家，是俄欧亚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但是从1991年乌克兰独立到2004年的“橙色革命”，再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掌控被迫一步步缩小和弱化，周边战略空间不断遭到挤压。如果说俄罗斯最初期待乌克兰在俄西之间选择俄罗斯，那么随着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乌俄关系彻底恶化，保住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底线。

如今，乌克兰东部战乱已经长期化，危机难以平息。波罗申科无力结束战乱，也无法改变经济崩溃的现状。俄罗斯遭到西方孤立，在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的打击下，经济形势全面恶化。旷日持久的乌克兰危机没有任何赢家，只给各方带来重重困难和障碍。俄美未来博弈还将继续。

世界经济

中缅经贸合作前景及其战略价值

□ 李敦瑞

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重要邻邦和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重要节点，缅甸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未来，中缅经贸合作的前景依然广阔，这也将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缅甸自身尚存诸多问题，但中缅之间成为“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乃是大势所趋。

缅甸的地缘条件及其与中国经贸合作的前景

缅甸南临印度洋，东北毗邻中国云南省，又位于印度、孟加拉国和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中间。仅从地理位置上看，其战略要冲的作用便可见一斑。历史上，缅甸就紧密关联着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与发展。现如今，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仍面临着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对外贸易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东部沿海是经济重心，主要的贸易物资和能源进口要依赖马六甲海峡，提出和实施“一带一路”构想，可以打破这种依赖。从中国自身来说，向西发展除了面向中亚、俄罗斯的西北战略通道以外，便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西南战略通道，而缅甸的地缘条件恰恰决定了其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

此外，缅甸自然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的矿产、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同时又建有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仰光、皎漂等优良的港口为中国海外贸易西出印度洋直接进入波斯湾、红海提供了可能。鉴于此，缅甸历来都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伙伴，而经贸合作也一直都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对缅甸进出口贸易增长势头十分强劲。从2011年至2013年，中缅进出口总额同比增加分别为73.2%、1.8%、35.6%。到2014年，中缅贸易额高达249.7亿美元，相比2013年更是增长了144.9%，中国已经成为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且，中国还是缅甸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截至2014年3月，中国累计向缅甸投资140亿美元，占缅甸吸收外资金额的近1/3。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缅经贸合作的前景仍将十分广阔。首先，中缅互为重要邻邦，中国战略利益的维护和缅甸自身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对方。其次，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极强。在贸易领域，中国主要向缅甸出口成套设备和机电、纺织、化工、金属、车辆配件等领域的产品，缅甸主要向中国出口矿产、农产、木材、水产、珠宝等领域的产品，这说明两国的贸易互补性极高。在投资领域，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而缅甸经济基础薄弱，其发展也需要重视吸引海外投资，能源、电信、制造业等领域都是缅甸吸引外资的重点，这些恰恰又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领域。再次，中国和缅甸经济增长速度都比较快，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辐射力也在增强，而缅甸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使其日益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市场和投资目的地。最后，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持续推进，缅甸的战略作用将不断凸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的扩大带来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中缅经贸合作对“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价值

随着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推进，建设“孟中缅印经济走廊”的进程将会大大加快，在亚洲，这将覆盖一个面积达1340万平方公里、人口将近28亿的巨大市场。虽然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总量，缅甸都相对偏小，但其作为连接中国、南亚、东南亚三大经济板块的枢纽，无疑将发挥至关重要的节点作用。中缅经贸合作的战略价值也将与日俱增。

中缅之间的合作涉及基建、能源、贸易、产业等诸多关键领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框架下，借助不断扩大的中缅经贸合作，缅甸一是可以吸引源源不断的中国投资进入铁路、港口、航空、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逐步改变落后的面貌；二是可以充分利用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对接中国巨大的市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增加本国的资本积累；三是可以承接中国的优质富余产能的转移，发展自身的产业体系，扩大就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四是可以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改善其自身的经济治理和企业管理水平；五是可以凭借地理优势，发挥连接中国腹地和印度、东南亚的陆上枢纽和连接中国腹地和印度洋的陆海联通枢纽作用，依托转口贸易、物流中转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

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契机，中缅两国可以增进合作，扩大经贸往来，实现互惠互利。依托“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中缅两国可以建成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运输交通网络，加强道路联通；可以围绕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政策和法律进行沟通、协调，加强政策沟通；也可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行磋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自贸区战略的延伸，加强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并且，中缅扩大经贸往来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为加强民心相通、增进友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可能存在的风险和现实考量

缅北的民族冲突给“孟中缅印经济走廊”的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不仅直接影响中缅两国的经贸往来，给两国的民间情绪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增加印度等国参与建设的疑虑。但客观上，这种中小规模的冲突尚不足以影响中缅经贸合作的大局。无论是缅甸政府还是缅北地方武装，都不可能在短期内依赖军事手段达到目的。缅北的和平乃至缅甸长期的稳定与发展，终究离不开冲突各方的对话与合作。缅甸毕竟不同于乌克兰，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具有良好的现实基础。这也符合缅甸各方以及中国、印度、东盟等利益攸关方的愿望。

随着缅甸国内的民主转型，其政治的多元化导致中缅关系受到更多力量和因素的影响，一些中方投资项目一度遇到挫折，这也给中缅的经贸合作增加了不确定性。然而，缅甸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决定了中国需要适应缅甸的变化，缅甸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中国的经验和资金。今年6月昂山素季的到访恰恰也表明了，无论缅甸政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为维系两国的友好与合作，都必须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尽管此次访问的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但两国加强合作仍是大的方向。中国本着睦邻、安邻、富邻的诚意，逐步扩大对缅甸的投资、援助和贸易往来，将使两国的相互依存程度更加提高。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存在着长期的艰巨性，美国、日本等国的战略竞争将带来难以估计的地缘政治风险，这对中缅经贸合作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而且近年来，西方国家与缅甸政府的接触日渐频繁，在缅甸的投资不断增长，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中国在缅战略利益的挤压。但缅甸对外政策的多元化，并不代表其可以忽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更何况，“海上丝绸之路”本就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战略平台，本着“亲诚惠容”的理念和求同存异的精神，中国可以与缅甸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与其他各国协调利益关系，以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因此，从大局着眼尽管不排除风险因素的存在，但在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的基础上加强经贸往来、实现互联互通，最终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中缅两国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战略视角